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林长民与五四运动

——兼论五四运动的起源

欧阳军喜

(清华大学 历史系 北京, 100084)

[摘要] 五四运动爆发之前,在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围绕着“铁路统一案”与“山东问题”的斗争中,林长民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先是致力于铁路统一案之提出与实施,继而力主把青岛问题与胶济铁路及其延长线济顺、高徐两路联系起来,之后又运动拒签和反对与日直接交涉。从整个过程来看,林长民与五四运动之发生、发展关系密切。从中也可以看出,五四运动虽因外交问题而起,但其中杂有许多内政的因素。五四运动既是社会变动和文化变化的结果,也是当时各派政治势力分化互动的结果。

[关键词] 林长民 五四运动 铁路统一案 山东问题

[中图分类号] K2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89(2003)06-0103-010

引言

关于林长民^①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在当时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当时政府方面、安福系均认为,五四运动“全是外交协会林长民等煽动起来的。”^[1]日本方面也认为,五四运动的出现,“有林长民、熊希龄、汪大燮等政治家的唆使,乃至英美二国人的煽动”。^[2]但是,学生方面却否认这一点。称“学生运动是完全出于青年们的爱国至诚,既没有什么党派作用,也没有什么政治背景。”^[3]而民党方面则认为研究系还没有这种能力来运动学生,“大学生之知识学问,岂汪大燮、熊希龄、林长民所能及,何至反无自动能力,无爱国的观念,必待彼等运动?”^[4]

一些五四运动的当事人及直接或间接与之有关的人在事后的回忆中也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均认为五四运动是由林长民等人煽动起来的。交通系的另一主要人物叶景莘也认为林长民对五四运动的爆发负有直接的责任。不过当时学生运动的领袖在事后的回忆中都不认同此说。罗章龙说五四运动的发起和指导者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罗家伦则说学生的行动几乎是一种临时的动议,也没有什么金钱背景。^[6]许德珩则称五四学生示威行动是由《国民》杂志社决定的^[7]。诸如此类的说法很多,但都否认受到了林长民和研究系的指使。

与时人的议论和事后的回忆相比,学界对这个问题表现出了不应有的忽视。周策纵在他的著作中几次提到了林长民,但他并不认为林长民有意煽动了学生运动,他认为学生运动的原动力来自于“摆脱殖民控制的切实要求”^[8]。一些大陆的五四研究论著,虽也提到了林长民和研究系,但基本上把他们当作五四运动的对立面来描述^[9]。有意思的是,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了五四运动与梁启超

[收稿日期] 2003-3

[作者简介] 欧阳军喜(1965—)男,湖南桂阳人,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① 林长民(1876—1925)福建闽侯人,字宗孟,1902年赴日留学,入早稻田大学,专修政治经济。1909年回国后,任福建省谘议局秘书长兼法政学堂教习。1912年任南京参议院秘书长,同年组织共和宪法会,后改为共和党,次年任众议院议员兼秘书长,进步党成立后任政治部部长。1917年任段内閣司法总长。1920年偕女周游欧美,1923年归国,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曹锟贿选总统时在沪参与反直。1925年11月入郭松龄幕府,不久兵败身亡。

之间的关系^①，但对林长民与五四运动之间的关系，仍然缺乏专门的研究。本文拟对林长民在五四时期的言论和行动作一分析，以期对这一问题作出说明，并进而揭示出五四运动的起源。

一、林长民与“铁路统一案”

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国内的亲日派与亲英美派围绕着铁路统一问题展开了一场斗争，这一斗争与五四运动的爆发息息相关。

1918年12月18日，徐世昌为了筹备巴黎和会，特在总统府下设立外交委员会，任命汪大燮为委员长，林长民为事务主任。设立外交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网罗朝野外交通才，共同研究当时外交问题，以辅助政府之外交决策。它是一个混合性的机构，有交通系和安福系的人，也有研究系或接近研究系的人，但实际负责的就是汪、林二人。

外交委员会成立后，即提出了对巴黎和会上的提案，共五大纲：（1）破除势力范围；（2）取消领事裁判权；（3）关税自主；（4）撤退外国军队；（5）停付庚子赔款。该提案于1919年1月6日通过后，因其内容与徐世昌最初对和会的期望大体吻合，因而得到徐的赞同。次日又由林长民呈代总理钱能训，然后电致巴黎各专使。外委会的这一提案，首列破除势力范围，其时势力范围被认为是远东最大的乱源。林长民说，“要把远东问题拔出祸根，非把我中国的地位安置稳固，非把各国在中国的所谓势力范围者根本破除。”^[10]林长民的看法与美国的观点一致却与日本的主张相反。美国一向奉行“门户开放”政策，所谓“门户开放”之语，其真意即为反对势力范围。美方认为，“中国在巴黎和会所应争取的要点，就是要求各国对历次发表尊重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共同宣言赋予具体而明确的内容，彻底废除地区优先权利制。”^[11]日本方面虽然声称其议和方针，“当提倡远东之平和主义与门户之开放”。^[12]日本所谓的“门户开放”，“其用意所在，欲藉此以解决美国移民问题”^[13]，即所谓人种案。而其所谓远东之和平，实际上是要保持它在中国，特别是在山东的特权。日本政府在给巴黎和会特使的训令中，第一条，就是要确保日本在战争期间，在山东省以及赤道以北南洋原属德属地所占领的领土利益^[14]。一方要破除势力范围，一方要保持势力范围，于是围绕着破除势力范围问题，美国与日本之间，国内的亲日派与亲英美派之间展开了斗争，其焦点就是铁路统一案。

由于列强各自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修筑铁路，造成了中国铁路不统一的现象，因此统一铁路被认为是打破势力范围的关键。外委会所拟的铁路统一案原文如下：“凡以外资外债建造，已成或未完成或已订合同而尚未开工之各铁路概统一之，其资本及债务合为一总债，以各路为共同抵押品，由中国政府延用外国专家辅助中国人员经理之，俟中国还清该总债之日为止，各路行政及运输事宜概由交通部指挥之。”^[15]按照外委会的解释，所谓“统一”是指“将该各路合为全国之铁路统系，概由一中央机关统辖指挥之，不使此路归此国统理，彼路由彼国承办，各用其本国之制度材料，而俨然成一瓜分豆剖之局也。”^[16]该案于1919年1月8日由国务院电令巴黎专使相机提出。之后一个月之内，国中尚无异议。不料2月初，交通总长曹汝霖忽持异议，称交通当局尚待研究，国务院乃再电巴黎各专使，嘱其缓提。之后，外交委员会委员陆宗輿也提出反对意见。曹、陆同系，即所谓新交通系。新交通系提出反对后，外委会的熊希龄、汪大燮与林长民诸人立即作出反应，以图挽回。2月17日，熊希龄分别致电上海赵竹君和广州岑春煊，请他们一致抗议，力争铁路统一案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并获得通过。次日，熊希龄又与汪大燮、林长民联名致电在巴黎的梁启超，内称“统一铁路，业得首座同意，前由院电专使，预备提议，近曹润田因某种关系反对，故院电缓提，各方正在力争，请密商

① 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张朋园：《梁启超与五四运动》，汪荣祖编，《五四研究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版；崔志海：《梁启超与五四运动》，《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张德旺：《重评五四运动中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赫斌、欧阳哲生主编：《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各使,亟图进行,国脉所系,勿为动摇。”^[17]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自新交通系发表反对意见后,旧交通系梁士诒也起而反对。新交通系之反对主要是为了维持日本在山东的利益,因为中国铁路若真统一,则曹、陆与日本签订的山东各路合同将归无效,从而也直接危及到他们自身的利益。旧交通系的反对则侧重于主权与管理。2月21日,梁士诒以铁路协会的名义致电巴黎各专使,认为“铁路统一”的实质是“铁路共管”,并认为这是英美方面的计划,反映了英美的意图。嘱咐议和专使“和议席上,如有提议,务乞痛驳拒绝,以保主权。”^[18]

铁路统一案的确与英、美两国有关。1919年1月,先是中英公司代表梅尔思(S. F. Mayers)发表了统一铁路管理的条陈,英文密勒评论报也发表评议,主张中国交通部设立一中央铁道公司,中、英、美、法、日五国各派一人组织委员会,总持其事,共同管理中国铁路^[19]。交通部铁路会计顾问美国人贝克(Earl Baker)又发表美、日、英、法、中共同管理中国铁路计划书。虽然英、美二国多次声明,梅尔思和贝克的提案系私人意见,但实际上还是得到了英、美两国政府的支持。当新、旧交通系出面反对该案时,英、美两国驻华公使分别召集赞成与反对双方进行调停,并力促该案之通过与实行。美使芮恩施(P. S. Reinsch)在1919年2月26日与梁士诒、汪大燮、曹汝霖、周子尘、熊希龄、陆宗舆及林长民7人谈话时强调,铁路统一于中国有利,统一之后其管理运输之权仍属中国^[20]。英使朱尔典(J. N. Joran)也与赞成反对该案的双方进行了谈话。他强调,铁路不统一,则无法打破各国在华之势力范围,势力范围不解决,则不特使中国政治上经济上不能统一巩固,且能引起国际纠纷,而铁路若能统一,“有三种利益,一为收回属于外人之路,二为收回中国在其领土内已失之行政主权,三为中国于不久将来,可完全自办铁路。”^[21]

英、美方面鼓吹该案似乎处处是为中国着想,实则是因为一战后日本势力在中国的膨胀日益危及到了他们的利益。为了限制日本的对华活动,美国政府提议组建新银行团^①,统一对华借款,特别是统一对华铁路借款,“其命意所在,欲使中国不为日本一国所为独吞,而恢复均势之局面也。”^[22]此举得到英、法的赞成却遭到日本及国内亲日派的反对。在英、美的调停下,林长民等人做了一些让步,表示政治性质之路与商业性质之路可以分别办理,即政治性质之路由中国借募总债赎回,商业性质之路一律自行办理,其余国有已成各路完全照旧自办,已订合同已开工未开工各路由交通部另拟标准合同,一面组织银行团为偿还旧债废止旧合同之准备。但政府方面在给专使的训令中仍表示“政治性质各路与租借地极有关系,必须审慎办理。能否提出大会,提出程度如何,以及提出有无弊害均应预筹之,希酌察情形,随时电院核办,至组织银行团系我自定计划,自可勿庸提出。再现在中国少数英美人民颇提倡共同管理铁道之议,如果在欧发布,务宜设法销弭。”^[23]当2月份陆徵祥收到梁士诒电后,曾复电梁士诒,告知铁路统一案尚未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并称“尊电所云外国愿收中国各铁路为共同管理等因,此间毫无所闻”,“此后如有所闻,遵当痛驳”^[24]。不料,1919年5月,中英公司又在巴黎和会上就该案提出秘密说帖一件,其内容大致谓将中国现在所欠各路借款,改为一宗公共统一之借款,且使各路管理方法亦归一律,以冀消灭势力范围^[25]。政府方面在接到陆使的报告后复电嘱其坚持反对,并称“国中三五无责任之反对政府者不察内容,且为利用,意欲以交通实权听由各国平均支配,以冀打破外国势力范围。”^[26]至是,主张铁路统一案之熊希龄、汪大燮及林长民诸人,不仅与交通系立于对立之地位,且与政府也立于对立之地位。

林长民是赞成且主张铁路统一的重要人物,他否认铁路统一案是联英、美之案,更非藉英、美以排日之案,而纯粹是从国家利益来考虑。他自述赞成且主张该案之理由有三:“(一)鉴于境内铁路

① 新银行团是相对于旧银行团而言。旧银行团始于宣统二年,由美、英、法、德四国组成。民国成立后,日、俄两国加入,四国银行团变为六国银行团。民国二年三月,美国宣告脱退,六国又变为五国。欧战爆发,德国被排除于银行团之外,五国银行团又变为四国银行团,俄国革命后事实上又变为三国银行团。欧战期间,英、法自顾不暇,所有借款全由日本垫付,三国银行团实际变为日本一员,日本在华势力至是乃极度膨胀,有见于此,美国乃于1918年6月提出组建新银行团方案,负责所有对华借款。参见《银行团之沿革之势力》(1—3),《晨报》,第178—180号,1919年6月11—13日。

之形势,应以统一办法收回他有各路,破除势力范围,消弭远东战祸;(二)鉴于铁路负债之重营业之亏,应以统一路债办法,举新债偿旧债从根本上整理以免积耗至破产;(三)鉴于吾国财力之不足铁路之不发达产业之阻滞,应从统一路债入手,输外资发展路线增益富源,即铁路营业亦受其利。”^[27]实际上,外委会及林长民的本意,却是要借此以解决山东问题。林长民说,目下巴黎会议,极难解决之山东铁路问题,更于统一铁路案内无形解决了,济顺、高徐两路垫款,于总债内可以收回,一转即为实际造路之用,岂不完全中日两国的交谊么?这是铁路统一论的真义。^[28]然而,希冀通过铁路统一案而解决山东问题,特别是济顺、高徐二路问题,因亲日派的阻挠及政府的反对未能实现,但却把山东问题推向一个引人注目的位置,林长民等不得不寻求其他解决山东问题的途径。山东问题遂成为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一个焦点问题。

二、林长民与“山东问题”

北京政府开始时并不打算在巴黎和会上提山东问题。据曹汝霖说,陆徵祥等人启程赴欧前,徐世昌总统曾召集会议,商议和会应付方针。参战督办段祺端认为,中国宣布参战过迟,有名无实,不应多提要求,除收回德奥租界,并取消其在中国之利益法权外,拟提议撤销庚子条约驻兵一条及修订海关税则。至青岛问题,日本一再宣言交还中国,谅不至食言,且看日本有无提议,随机应付,众无异议,就此决定^[29]。北京政府不愿在和会上提出山东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与日本发生冲突,加上与日本间有1918年9月24日换文^①存在,此约已解决山东迫在眉睫的日军占领胶济铁路沿线地区,不愿撤军及擅设民政署等问题。北京政府认为在和会上提山东问题不见得对中国有利。顾维钧则力劝政府,中国应在和会上理直气壮地提山东问题,不必顾虑被迫签订的中日条约。不过北京政府于1919年1月8日给代表团的训令中,仍不包括山东问题。可见从一开始政府与专使之间在“山东问题”上即存在分歧。

“山东问题”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1)“山东问题”除青岛归还问题外是否包括山东境内胶济铁路及其延长线济顺、高徐二路?(2)山东之归还还是由德国直接归还还是经日本间接归还?关于第一点,政府方面认为,济顺、高徐两路与青岛问题无关。政府方面解释说,“济顺高徐借款与青岛本不相涉,当日订约之意,因日本占据胶济铁路后,日军布满沿线并在坊子等处设立民政署,虽经我政府迭次抗议,迄未承认,不得已始以铁路借款为撤退日军废止民政署之条件,其时军政两费无可罗掘,又值欧战未终,欧美各国无从商借,始于七年九月商订济顺高徐铁路借款预备合同,同时并订交换文件,如撤退胶济沿线日本军队,由中国自由组织巡警队保护铁路,又撤废民政署等项,可知路线系临时假定,其第二条并规定此项路线由政府与银行协议变更,并非许其继续德国权利,与二十一条绝无关系。其时曹汝霖任财政总长,章宗祥任驻日公使,与当事诸人悉力磋商始克有此结果。从前指路垫款如钦渝同成等成例甚多,而此项借款十足交付并无回扣,尤能破除惯例,中外咸知此济顺、高徐借款问题与青岛无涉之实在情形也。”^[30]主持其事的曹汝霖、章宗祥也极力辩解。章宗祥说,有关济顺、高徐两路的换文,是“中国当局为补救临时及预防将来起见”而采取的措施,“实为有利国家之事”,“换文各款,与交还青岛问题纯为两事,更与二十一条毫无关系,换文之非允许日本继承德人权利,彰然可见。”^[31]但是在野的研究系要人林长民、梁启超等人坚持山东问题必须包括济顺、高徐两路问题。研究系的机关报《晨报》在一篇社论中说,“所谓山东问题,不仅青岛已也,青岛而外,如胶济铁路及其延长线等(即济顺高徐两路)皆关山东全

① 换文内容如下:(一)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二)胶济铁路之警备,可由中国政府组成巡警队任之;(三)上列巡警队之经费,由胶济路提供相当之金额充之;(四)上列巡警队本部及枢要驿并巡警养成所内,应聘用日本人;(五)胶济铁路从业人员中应采用中国人;(六)胶济铁路所属确定以后,归中日两国合办经营;(七)现在施行之民政撤废之。参见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第16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省之命脉,不可有一容人鼾睡者也,仅提青岛纵使可得,倘胶济问题不有决解,则远东之乱源未弭即鲁省之实质无存。”^[32] 1919年2月23日,抵法后梁启超也致电林长民等,强调“胶济诸路关切肤利害,不能与青岛分为两案。”^[33] 林长民、梁启超与政府方面及曹汝霖、章宗祥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其实是,谁应对山东问题负责?

另一方面,就是归还山东的手续问题。是由德国直接归还呢,还是经日本间接归还?日本方面坚持要由它来交还青岛。陆徵祥赴欧前经过日本,会晤了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及牧野全权。内田称,日本政府将来必照前定交还中国之精神进行,惟照法律手续,形式上须俟日本向德国取得后,再行交还中国,并力言中日两国务宜步调一致,但陆专使对此“答甚含糊”。对日本方面表示愿将赔款退还中国,“陆闻之亦不置词”章宗祥对此十分不满,并因此愤而提出辞呈。他认为陆使的态度,表明他“受人唆动”^[34]。徐世昌、段祺瑞均默认经日本归还的方式,交通系、安福系也同此主张^①,只有在野的研究系主张由德国直接归还。议和专使是否受了研究系的“鼓动”,我们不得而知,但专使在和会上所持的态度,则绝对反映了林长民、梁启超等人的主张。1919年1月27日,日本在巴黎和会上要求德将胶济铁路及其他利益无条件让与之,交还中国一事绝不提及。次日,顾专使在会上发言表示,山东因历史、人种、宗教、风俗、语言、国防等关系,与别种海屿不同,应令德国将所租青岛及胶济铁路及附属权利,完全直接归还中国。梁启超对顾使的表态极为满意,他在给汪大燮、林长民的电文中说,“抵英即闻和会已提青岛问题,顷抵法略悉此间经过情形,大致与吾辈在京主张相同,颇为欣慰。宣战后中德条约根本取消,青岛归还已成中德直接问题,日虽出兵,地位与协约国等,断不能于我领土主权有所侵犯,更不能发生权利继承问题,超在京时曾将此议向该国外交界要人剴切忠告,不审彼朝野有无觉悟,吾辈着眼不在归还之名义,而在主权之实际”^[35]。

然而事态的发展却没有按林长民、梁启超等人的设想和专使的希望进行。当1月28日五国会议山东问题时,顾专使在会上提出,所有中、日在欧战期内所订条约,换文合同等,因中国加入战团,情形变更,该项条约等均认为临时性质,须交大会决定等语,美国总统威尔逊遂询问日本全权,所有中、日间签订的密约,可否提交大会。牧野全权答称,须请示政府。英、美、法各全权又问中国是否愿意交出,顾使即答以我国并无反对之意。日本对中方的态度极为不满,驻京日使小幡奉其政府训令,到外交部抗议,政府遂电令议和专使,在将密约提交大会之前,先与日方代表接洽,于是1915年中日关于山东的秘密换文及1918年关于胶济铁路之换文全部提交给大会。

然而,密约的宣布却使中国陷入了一种尴尬境地,因为1918年9月中日换文,无异于中国承认了二十一条。议和专使不得不向各国说明,二十一条系由日本胁迫而成,而1918年9月之约则系临时性质。与此同时,梁启超在欧洲也开展活动。他一面依据赴欧前与林长民等人商定的意见撰文鼓吹^②,一面遍访各国政要。但是,由于英、法两国与日本有密约在先^③,难以援助中国。4月16日,五国会议再次讨论山东问题,美国代表提出折衷办法,即由德国声明抛弃权利,交五国公同暂收,日本专使仍未同意。4月22日,五国会议继续讨论,陆徵祥与顾维钧应邀出席。会上美国总统表示,山东问题十分复杂,中国、日本既有1915年5月条约换文于前,又有1918年9月订条约于后,而英、法等国亦与日本协定条件,有维持其继续德国在山东权利之义务。欧美并非不欲主持公道,无奈为先时种种条件所束缚,难以援助中国。英总理提议将胶州问题分两层办法,一按中日协定条

① 梁士诒拟订的议和方案第二条即是“青岛交还问题”,但他所指的“交还”是本国向日本收回青岛,“其理由是:(1)日本应践交还之言。(2)此次大战及各协商国扶弱制强,并无私利自存之心。(3)美总统媾和条件第五款可为依据。见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下)第3—6页,自刊,1946。

② 梁启超在1919年3月6日给汪大燮、林长民的电文中说,“超已在此间大报馆发表意见数次,且别撰小册名曰中国问题与世界和平,所鼓吹略如在京原议,惟于山东问题更加发挥”。见《晨报》第91号,1919年3月13日。

③ 1917年2月,日本外相本野发别与驻日英、法大使达成协议,英法两国表示将来在和会上愿意支持日本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的要求。见《丑态毕露之协约国秘密外交》,《晨报》,第185号,1919年6月18日

件；一使日本继承德国权利。由中国自己选择。顾使当即表示，二者均非所愿。二天后，中方正式提出说帖，分送美、英、法三国首脑，表示英国总理所提两层办法，于中国均有危险，同时提出办法四条：（一）胶州由德国交还中国起见，先交五国暂收；（二）日本承认于对德和约签字日起，一年以内，实行上条之交还；（三）中国重视日本因胶州军事所有费用等，愿以款项若干作为报酬，其额由四国公决；（四）胶州湾宣布开作商埠，如有必需之处，亦可划一区域作为专区，任订约国人民居住、通商。4月30日，三国会议最终决定调停办法如下：“德国前在胶州及山东省所有各项权利，一概放弃，交于日本，日本自愿担任将山东半岛连同完全主权，交还中国。”^[36]随后该决定由美国代表团随员贝克口头通知了中国代表团^[37]。梁启超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致电汪大燮和林长民，内称，“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查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38]林长民在接到梁启超电后，特于5月2日在《晨报》、《国民公报》上发表题为《外交警报敬告国民》的署名文章，全文如下：

“昨得梁任公先生巴黎来电，略谓青岛问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颇为所动，闻将直接交于日本云云。

呜呼，此非我举国之人所奔走呼号，求恢复国权，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日本无承继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耶？我政府我专使非代表我举国人民之意见，以定义于内折冲于外者耶？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任公电，乃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利，交由五国商量处置，惟须得关系国之同意，我国所要求者，再由五国交还我国而已，不知因何一变其形势也。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千九百十五年之二十一款及千九百十八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款出于胁迫，胶济换文以该路所属确定为前提，不得迳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草约为预备合同，尚未正式订定，此皆我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39]

有人称林氏此文为五四运动之导火索^[40]。日本方面也认定林氏此文应对五四运动之爆发负责，为此5月21日，驻京日使小幡西吉特用正式公文照会我外交部，内称，“外交委员干事长林长民君，五月二日《晨报》、《国民公报》等，特揭署名之警告，文内有‘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等语，似有故意煽动之嫌，此事与五月四日北京大学学生酿成纵火伤人暴动之事，皆本公使之深以为遗憾者。”^[41]政府得日使照会后曾由总统派人转告林长民，请其对外言论稍加谨慎。警备司令段芝贵亦托人转达林氏，谓彼与林氏个人并无意见，惟彼有维持地方治安之责，万一外间风潮涉及林氏，彼实无法办理，故劝林君凡事不可出头。又《晨报》也因此事受到检查和监视，自1919年5月24日后所有新闻稿件均须经京师警备厅审核后方准登载。林长民因此愤而辞职，他在辞呈中写道：“长民愤于外交之失败，发其爱国之愚，前者曾经发布论文，有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等语，激励国民奋于图存，天经地义不自知其非也。但无加危害于日本人之据。彼日本人绝无可以抗议之理由。且有国者不讳亡，长民措语未为过甚，胶州租借于德国者廿年，当时实为暴力所屈，今日乃高唱人道之世，尚有袭德国之政略，继承其所得者，我犹甘之，是我承认其举动为正义为人道也。非亡而何？藉日交还，然择肥而噬，得步进步，满州前事，二十一款前事，能无寒心。势力侵袭，利权日失，空拥领土，所存几何？山东亡矣，国不国矣，长民尚欲日讨国民而告之也。”^[42]之后，林长民又有《告日本人书》发表，奉劝日本不要继续其侵华的错误政策。^①

① 他在《告日本人书》中写道：“吾今敢正告日本人曰：吾国人之对君等，实有不可讳言之痛矣，除极少数之外，不论阶级高下，知识深浅，思想新旧，观察纵有不同，饮恨几乎一致，经一度事变，便增一分怨毒，毋谓吾人爱国无持久性也。假令事变之生，继续不已，君等估过，迄无悛心。相激相荡，终有不堪设想者。若在强权之世，君等固有一日之忧。虽然，今何时矣！无论潮流变迁，未容君等悉奏长技，即令人人袖手恣君所为，吾辈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以上之民族，文化智能又有牢不可拔之根基，一战而霸，遂足为君等贺耶？吾民遂永戴君等而易其宾主之位耶？此种根本见解，吾固深信君等必有彻底觉悟者。”《林长民告日人书》，《申报》1919年6月3日。

没有证据表明,五月四日学生示威事件的发生,是直接受了林长民5月2日之文的刺激,但是,把山东问题与济顺、高徐两路联系起来,进而国内舆论把外交失败都归咎于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诸人,则是受了林长民、梁启超等人的宣传鼓动。他们一个在国内,一个在国外,但宣传的口吻是早已商定好了。^①从这个意义上说,林长民应对五四运动的爆发负责。

三、林长民与“拒签德约”

自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警报传出之后,签字问题成为斗争的焦点。

5月3日,国民外交协会^②召开全体职员大会,筹议应付时局办法。林长民、熊希龄、王宠惠、庄蕴宽等3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后发表的致各省通电称,“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消息极紧。查日本所藉口之民国四年五月二十一款之约系以武力胁迫,又民国七年九月关系胶济铁路之换文,顺济高徐铁路之草约并非正式订定,我国民决不以为有效,本会定于本月七日即二十一款签字之国耻纪念日在北京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正式宣言,并要求政府训令专使坚持,如不能争回国权,宁退出和会,不得签字,望各地方各团体同日开会以示举国一致。”^[43]

第二天,五四运动就爆发了,学生烧毁了曹汝霖的住宅并痛打了章宗祥,结果有32人被捕。^③林长民立即开始了营救学生的行动,他与汪大燮等人各以个人私意进言于总统,请将学生释放。5月5日,林长民又与汪大燮、王宠惠联名呈请警察厅,请予将学生保释。6日早,林长民复入总统府谒总统并要求三事:(1)请政府对于山东问题表示一决心,以维持民望;(2)请将被捕各学生保释以免再激生风潮;(3)7号必开国民大会请饬军警勿用强力解散或加无理干涉。对于第一点总统答允照办,并称二日以前曾有一训电致各专使,饬其坚持到底,主张暂由五强共同管理,其处置应得中国同意,但能让步至此,否则不能再让步。总统并称电稿在外交部,林君尽可亲往外交部取阅,并可宣示国民。关于第二点,总统称学生已交京师地方检察厅办理,能否交保请与检厅接洽^④。对于第三点总统则主张仍不许开会,态度极为坚决。林长民回到外交协会,将上述情形报告会众,讨论结果,即由熊希龄、范源廉、王宠惠、林长民诸人再往谒钱能训总理,告以事实上7号不能不开会。6日晚熊、范、王、林四人具一缄致钱总理,略谓政府禁止开会一切理由曾经报告会众,奈何开会地点日期早已决定布告,万难取消。约法规定人民有集会之自由权利,政府不能剥夺,况国民大会之目的在一致对外,民气方盛,正可用为外交后援,不能遇事压抑,激成反动。若政府必欲禁止或干涉,亦听政府所为而已。

5月7日下午一时,各界群众争赴中央公园开会,但该园早已闭门且四周有警察严守,不得入内。是日到会之人,由中央公园而石虎胡同,由石虎胡同而商务总会,由商务总会而先农坛,又由先农坛复回石虎胡同,会议乃得以召开。最终全体议决四项:(1)宣布取消民国四年五月七日二十一条;(2)胶州青岛应由德国直接交还我国;(3)胶济及顺济高徐铁路换文认为无效;(4)巴黎和会如不容我主张我专使不得签约。并决定下星期日仍开大会,一致对外。万一政府再行禁阻即改在山东、南京等地,联合各省开国民大会,务达对外目的。会后国民外交协会致电巴黎各专使及各省团体,呼吁一致对外。

在签字问题上,除了国民外交协会坚决主张拒签之外,在政府方面和议和专使内部都存在有不同意见。政府方面,由钱总理一派所组织的己未俱乐部力主签约。5月24日,政府发出通电,明确

① 1919年4月梁启超在给林长民的一份电文中说:“著论演说,历访要人,所言悉如尊旨。”《晨报》第129号,1919年4月23日。

② 国民外交协会成立于1919年2月16日,其宗旨是:对外发表公正民意,为外交上之援助。张謇、熊希龄、林长民、王宠惠、严修、范源廉、庄蕴宽七人为理事,梁启超为驻欧代表。

③ 在被捕的32人中,其中有一人为市民,其余均为学生。

④ 被捕学生于7月全部释放,此前汪、王、林联名保释,当局不许。之后,北京十三校校长及山东省国会议员联名呈保,亦不许。继而熊希龄、王家襄、范源廉、张一、高而谦等人及天津十校长亦联名呈保,学生乃得释放。

表示“第一步自应力主保留,以俟后图,如保留实难办到,只能签字。”并说,“此时国家为重,地方秩序自应切实维护,京师地面现已严饬主管认真办理,倘各省区有不肖之徒藉端煽惑,务希悉力制止,用遏乱萌。”^[44]政府的这种态度引起民众普遍不满。安福派乘机发动倒阁,钱能训既处于群疑之中,安福部又从而掣其肘,只好提出辞呈,由龚心湛代理,政界引起轩然大波,总统徐世昌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在签约的问题上只好采取一种暧昧的态度。据顾维钧称,“直到6月28日下午,中国代表已经拒绝出席和会全体会议之时,代表团从未收到北京关于拒签的任何指示。”^[45]

代表团方面,开始时大家一致认为德约中除保留山东三款^①外,应该签字,但万一保留一层办不到是否签字,则有不同意见。顾维钧、王玉廷、伍朝枢主张不签,胡维德主张签约,陆徵祥则犹疑不定。直到6月28日签字之日,代表团仍在作最后的努力,分函声明“彼等之签字于条约并不妨碍将来于适当之时机,提请重议山东问题。”^[46]但和会最高会议拒绝接受并将原函退回,中国代表团遂决定不签字,当日,陆徵祥、王正廷、顾维钧、魏宸组四全权电告政府交涉经过及不签字之缘由,电文称:

“和约签字。我国对于山东问题,自五月二十六日正式通知大会,依据五月六日祥在会中所宣言维持保留去后,迭向各方竭力进行,迭经电呈在案。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仅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之提请重议云云。岂知直[至]今午时完全被拒。此事于我国领土完全及前途安固,关系至巨,祥等所以始终不敢放松者,固欲使此问题留一线生机,亦免使所提他项希望条件生不祥影响。不料大会专横至此,竟不稍顾我国家纤微体面,曷胜愤慨!弱国交涉,始终让,几成惯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之可言。内省既觉不安,即征诸外人论调,亦群谓中国决无可以轻于签字之理。详审商榷,不得已,当时不住签字。”^[47]

中国拒签德约后,日本一面暗中运动英、法出面调停,使我补签德约,一面声明愿与中国政府直接交涉,将胶澳租借地主权归还中国。1919年8月,日本外务省参事官芳泽谦吉为直接交涉来华活动,先后拜会了章宗祥、曹汝霖,也拜访了林长民^[48]。林长民的态度可从国民外交协会发布的通电中看出,其致各省通电云:“我国在欧洲和会业已拒签德约,对外则有专使之宣言,对内则有政府之布告,口血未干,信誓旦旦。直接交涉为是耶,则不应拒签于前。拒签德约为是耶,则不应直接交涉于后,盖直接交涉即系承认德约,承认德约即系承认日本继承德人在山东之权利。”^[49]其致顾维钧专使电云:“鲁案不能与日直接交涉,应提出国际联盟解决,全国民意同此主张,从前中德条约规定德不得以山东权利另贷与其他强国,巴黎和会德遂许日本继承山东权利,显背条约。请公先以德之违约提出国际联盟,请求取消对德问题,既解决后请解决对日事,至本会前建议七款,……亦请相机陆续提出以求解决。”^[50]此后,林长民主要致力于通过国际联盟来解决山东问题。1921年2月,林长民以中华促进国际联盟总会驻欧支部董事会会长的身份联合旅欧学生上书国际联盟各专使,阐明了在国际联盟大会上提出山东问题的理由,并说:

“吾人今日之山东政策,乃吾人对于吾祖宗吾子孙尽保疆土之无上义务。吾人一息尚存,即当竭力尽气以恢复之,死而后已,成效固不足计。各国之对我如何,不足顾也。友邦之有无及其援助之多寡,不足论也。吾人苟有一毫依赖心,自暴自弃心,怯懦心,气馁心,即将无以对吾艰难创业之

① 和约内关于山东之条款有三,原文如下:第一百五十六条,德国允将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三月六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德条约所规定胶澳租界暨铁路、矿山及水底电线等项,与其他中、德迭次所订关于山东之各案先后所规定德国享受之种种权利及所有权或特权,完全与让日本,尤以一九八八年中、德胶澳条约所规定者为最重。至德国对于胶济铁路及其支路所有一切权利,连同附属各该路之种种财产,如车站、机厂、工场及车辆并矿山、矿场与兴办各矿之一切材料及附属于各该财产之权利及特权,现已为日本所取得者,仍归日本继续享有。至德国之国有胶沪、胶烟等水底电线及所有附属于各该电线之权利及特权暨财产,亦一律归日本所得,无庸付费,并无附带条件。第一百五十七款,所有胶澳租界内德国之国有动产暨不动产以及关于该租界德国或因自行兴办各业与因直接或间接曾支出经费所应得之权利,现已为日本取得者,仍归日本继续享有,无庸付费亦并无附带条件。第一百五十八款,自本约将来施行之日起,限三个月内,德国须将关于胶澳之民事、军事、财政、司法及其他行政之档案、簿册、契据暨各种详图及公文,均移交日本。《秘笈录存》,第204页

祖宗,及吾人继来之孙子,而亦必永无成功之希望矣。”^[51]

林长民等人之此次上书,距五四运动的爆发已近2年,此时,学生运动已趋平静,社会也恢复了常态,政局也稳定了下来,但林长民却仍关注着山东问题的解决与未来,仍在为山东问题奔走呼号,且态度始终一致。

结 论

我们从五四运动爆发前后林长民为山东问题所做的各种努力中看到了一种激烈的态度,这似乎与林长民研究系的身份不符。研究系自创党以来,其所取政策,即系与现有势力相结合,意欲乘机而指导之,改造之,使成为国中之中坚力量,以求安定一时之社会秩序,并徐图发展。但在五四运动期间,林长民的态度始终是激烈的,甚至是与政府对立的。对此,林长民解释说,“鄙人前此对于政治问题,当新旧势力嬗嬗之际不宜操之过急,故所主张宁偏于缓进方面,其间常有不可告人之隐痛,然皆隐忍持重,无非委曲以求全,顾其结果与期望相反。今者既无全可求,则为私人计无委曲之必要,为团体计更无委曲之必要,惟有披沥所信,勇往迈进而已。鄙人蓄此信念已有两年余,适去年本会[指国民外交协会——引者]成立,乃得实行所信,与诸君呼号奔走稍尽绵力,长民政治生涯从此亦焕然一新。”^[52]

透过林长民与五四运动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五四运动因外交问题引起,但其中却夹杂了许多内政的因素,研究系、安福系、交通系、己未俱乐部、国民党及国民党中的小孙派均卷入其中,学生运动最终成为政争的工具。汪大燮在事后感慨地说,陆宗輿之被谤,“统言之,政治作用而已。”^[53]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五四运动既是社会变化和文化变化的结果,也是当时各派政治势力之斗争的结果。换言之,撇开当时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分化互动,而单纯从社会经济背景或文化思想变化的角度,就无法真正了解五四运动的起源。

[参 考 文 献]

- [1] 亿万.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J].每周评论,第21号,1919年5月11日。
- [2] 转引自林明德.日本与五四[C].汪容祖编《五四研究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92页。
- [3] 言豪.回忆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Z].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五四运动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版,第116页。
- [4] 霜.北京特约通讯[N].《民国日报》,1919年5月19日。
- [5] 罗章龙.五四运动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Z].《五四运动亲历记》,第45—47页。
- [6] 罗家伦.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Z].《五四运动亲历记》,第65—65页。
- [7] 许德珩.回忆五四运动[Z].《五四运动亲历记》,第27页。
- [8] 周策纵著,周子平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页。
- [9] 参见汪士汉著.五四运动简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107页;彭明著.五四运动史(修订版)[M].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4、563页。
- [10] 林长民在国民外交协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N].《晨报》,第80号,1919年3月2日。
- [11] 芮恩施致国务卿函(1918.11.23)[Z].《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9年,第63页。
- [12] 日议和特使与东亚问题[N].《晨报》第32号,1919年1月6日。
- [13] 东京特派员渊泉.日本之讲和态度[N].《晨报》,第37号,1919年11月11日。
- [14] 转引自黄自进.吉野作造对近代中国的认识与评价[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第189页。
- [15] 外交委员会决议统一铁路原委[N].《晨报》第77号,1919年2月27日。
- [16] 铁路统一案原文之解释[N].《晨报》第85号,1919年3月7日。
- [17] 《致广州岑云阶电》(1919.2.17),《致上海赵竹君电》(1919.2.17),《致巴黎梁任公电》(1919.2.18),《熊希龄先生遗稿》,电稿四,第3511—3513页。
- [18] 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Z](下),自刊,1946年,第14页。
- [19] 译上海密勒评论.全国铁路统一问题[N].《晨报》第68号,1919年2月18日。
- [20] 美使关于铁路问题谈话[N].《晨报》,第87号,1919年3月9日。
- [21] 转引自张嘉著,杨湘年译.中国铁道建设[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29页。
- [22] 刘彦.论新银行团与中国之利害[J].《太平洋》,第2卷第4号,1920年3月5日。

[23] 林长民. 统一铁路问题[N].《晨报》,第 119 号,1919 年 4 月 13 日。
[24] 《晨报》第 85 号,1919 年 3 月 7 日。
[25] 陆徵祥报告路事原委电[N].《民国日报》,1919 年 6 月 16 日。
[26] 政府拒绝铁路共管之要电[N].《申报》1919 年 5 月 27 日。
[27] 林长民. 铁路统一问题[N].《晨报》,第 126、128 号,1919 年 4 月 20 日至 22 日。
[28] 林长民. 统一铁路问题[N].《晨报》,第 78 号,1919 年 2 月 28 日。
[29] 曹汝霖.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Z]. 第 146 页,台交,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
[30] 政策之外交问题说明书[N].《晨报》第 154 号,1919 年 5 月 17 日。
[31] 章宗祥. 东京之三年[Z].《近代史资料》,1979 年第 1 期,第 53—54 页。
[32] 和. 山东问题[N].《晨报》第 131 号,1919 年 4 月 25 日。
[33] 梁任公先生来电原文[N].《晨报》第 78 号,1919 年 2 月 28 日。
[34] 章宗祥. 东京之三年[Z].《近代史资料》1979 年第 1 期,第 54 页,62 页。
[35] 梁任公先生来电原文[N].《晨报》第 78 号,1919 年 2 月 28 日。
[36] 近代史资料专刊. 秘笈录存[Z]. 第 135 页。
[37] 美上院讨论山东问题详情(十续)[N].《晨报》,第 318 号,1919 年 11 月 5 日。
[38] 丁文江. 赵丰田编. 梁启超年谱长编[Z]. 第 880 页
[39] 林长民. 外交警报敬告国民[N].《晨报》第 139 号,1919 年 5 月 2 日。
[40] 梁敬 . 林长民先生传[Z].《传记文学》第 7 卷第 2 期。
[41] 请看日使质问之照会[N].《民国日报》,1919 年 5 月 27 日。
[42] 林长民辞职之呈[N].《晨报》,第 164 号,1919 年 5 月 27 日。
[43] 国民外交之决心[N].《晨报》第 141 号,1919 年 5 月 4 日。
[44] 政府主张签字之措辞[N].《晨报》第 175 号,1919 年 6 月 8 日。
[45] 顾维钧回忆录[Z]. 第一分期,第 209 页。
[46] 王芸生编著.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M]. 第七卷,第 352 页。
[47] 《秘笈录存》[Z]. 第 223 页。
[48] 王光宇关于日外务省参事官芳泽谦吉为鲁案直接交涉来华活动报告[Z].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3 辑,第 474 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49] 国民外交协会反对直接交涉[N].《晨报》第 405 号,1920 年 2 月 4 日。
[50] 国民外交协会之要电[N].《晨报》第 437 号,1920 年 3 月 14 日。
[51] 林长民. 梁龙及旅欧学生上国际联盟各专使书[N].《晨报》第 749—750 号,1921 年 2 月 21 日至 22 日。
[52] 国民外交协会饯别会林理事长长民之演说[N].《晨报》第 436 号,1920 年 3 月 13 日。
[53] 汪大燮. 陆宗輿〈五十自述〉序[Z]. 见陆宗輿:《五十自述记》,北京日报承印本。

Lin Chang-min and the May 4th Movement

Ouyang Jun-xi

(Department of History, Q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various political forces in China contended with each other on the “Railway Unification Plan” and the “Shandong Issue”. At firs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elegation did not intend to bring up the “Shandong Issue”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but only expected the solution of this issue by means of the Railway Unification Plan. It was only after the Railway Unification Plan failed to pass that the Shandong Issue became the focus. During this course, Lin Chang-min played a key role. First, he exerted himself to the proposi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Railway Unification Plan. Then he firmly maintained that the Qingdao Issue should be linked with Jiaoji Railway and two extension lines of Jishun and Gaoxu railways, before he launched the campaign against signing the peace agreement and direct negotiation with Japan. All this shows that Lin Chang-min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outbreak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Lin’s relationship with the May 4th Movement shows that the May 4th Movement, though resulting from diplomatic issues, involved many domestic factors. The May 4th Movement is not only the outcome of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but also the result of the division and interaction of different political forces in China.

Key Words: Lin Chang-min, May 4th Movement, Railway Unification Plan, Shandong Issue

[责任编辑 周 珉]